

日本新建築 系列丛书 17
SHINKENCHIKU JAPAN

医疗设施

Medical Facility

日本株式会社新建筑社 编/译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日本新建筑系列丛书17

医疗设施

日本株式会社新建筑社 编/译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编委会名单

主 编 (中) 范 悦

(日) 四方裕

编委会成员

中方编委 王 昀 吴耀东 陆 伟

茅晓东 钱 强 黄居正

魏立志 (按姓氏笔画排序)

海外编委 吉田贤次 多田亮彦

目 录

- 现代城市的九律
- 006 **现代城市的九项缺陷** 西泽大良 (建筑师)
- 018 **山形大学工学部创立100周年纪念会馆**
高宫真介/规划·设计工房
- 030 **屋久岛信使** 堀部安嗣建筑设计事务所
- 046 **真壁传承馆** 设计组织ADH
- 卢内斯音乐厅
- 056 **旧日本银行冈山分行Ⅱ期改造**
佐藤建筑事务所 / 冈山县设计技术中心
- 高松丸龟町商店街
- 064 **一号街、二号街、三号街拱廊**
高松丸龟町商店街B·C街区小规模连锁型重新开辟事业
福川裕一 西乡真理子+SHEEP NETWORK城市建设公司 (总括)
SHEEP NETWORK城市建设公司 JSP (设计)
- 综合教育研究楼
- 071 **东北大学片平校区**
东北大学设施部校区计划室 三菱地所设计
- 079 **东北大学青叶山东校区中央广场 中央楼**
山本·堀建筑师
- 089 **穗积木材加工所项目**
山崎亮 studio-L (总监)
吉永建筑设计工作室 SPACSPACE ARCHITECT TAITAN
dot architects tapie SWITCH建筑设计事务所 (设计)
- 096 **功德林寺** 板垣元彬建筑事务所
- 问卷调查
- 105 **今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建筑因地震产生了哪
方面的变化
- 114 **足利红十字医院**
近藤彰宏+盐田洋+高岛玲子/日建设计
- 122 **爱知太阳森林 森林住宅**
中村勉综合规划事务所
- 130 **舩之家瑞穗** 大建met
- 138 **袋田医院 新病房楼**
梶原良成+ GEOBIODESIGN
- 146 **高崎市综合保健中心·高崎市立中央图书馆**
佐藤综合计划+大成建设
- 155 **每月评论**

新建筑 17

新建筑

株式会社新建築社，東京

©2012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著作合同登記06—2011年第282号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医疗设施 / 日本株式会社新建築社编译. —大连: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2. 6
(日本新建筑系列丛书; 17)
ISBN 978-7-5611-6985-8

I. ①医… II. ①日… III. ①医院—建筑设计—日本—现代—图集 IV. ①TU246-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19036号

出版发行: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地址: 大连市软件园路80号 邮编: 116023)
印刷: 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 221mm×297mm
印张: 10 插页: 1
出版时间: 2012年6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出版人: 金英伟
统筹: 房磊
责任编辑: 张昕焱
封面设计: 王志峰
责任校对: 张媛媛

ISBN 978-7-5611-6985-8
定价: 98.00元
电话: 0411-84708842
传真: 0411-84701466
邮购: 0411-84708943
E-mail: a_detail@dup.cn
URL: http://www.dup.cn

建筑论坛

现代城市的九律

现代城市的九项缺陷

西泽大良

(建筑师)

一、写给年轻读者

这篇文章要讲述的是当今城市的缺陷。“今日城市”固然意味着“现代城市”，不过与20世纪60年代以来对现代城市规划的批判性讨论^{注1}是不一样的。因为60年代并未受到重视的现代城市的关键问题在90年代后半期开始凸显。然而，这个问题直到今天都尚未受到建筑界的关注。就是因为当今建筑界对(现代)城市形态现状缺乏批判性的考察，导致面对城市缺陷时无动于衷。估计各位读者都忘了东京也是个现代城市，比起60年代的东京来说，90年代后半期之后的东京才是现代城市，可能也有一些人是有点概念的。我们作为城市和建筑方面的专家，陷入这样的健忘症中，关于当今城市的问题就永远找不到答案。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之一就是以90年代后半期以来的城市现象为前提，针对(现代)城市形态的缺陷给当今的城市所带来的问题提供新的思路。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目的，大概在70年代初，人们对那些现代城市缺陷的持续追求才放下脚步，其后到至今40年间，现代城市状况危机四伏，而必要的城市理论却没有得出。所以对70年代以后出生的20到30多岁的人而言，自己的城市面临着怎样的危机，他们自身是感觉不到的。虽然笔者多年以来在大学等场合宣讲过城市形态缺陷的问题^{注2}，囿于时间所限，基本的用语和实例难以详举，只能泛泛而谈。而从90年代后半期以来，至少可以明确认识到的是，现代城市的缺陷并没有在60年代完全改进，今后会给世界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为此买单的不是别人，正是年轻人。不管是现在的年轻人还是即将出生的孩子们，都必须意识到现代城市的缺陷。本文正是此意，希望为年轻读者尽可能地呈现把握现代城市形态现状的方法，并提出应对缺陷的提案或议题，祈望终能传达笔者力所能及的从现代城市向别的城市形态转换的方法。

注1：指后文“三、1960年代的现代城市批判”中所述《城市不是一棵树》(克里斯托弗·亚历

山大, 1955年)以及《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简·雅克布斯, 1961年)等。

注2：后文“现代城市的九项缺陷”相关话题笔者和在大学宣讲的场次如下：

·东京理科大学4年上期终讲评会(2009年7月、2010年7月)和特别讲义(2010年12月)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演讲(2009年7月)

·东洋大学讲评会公开研讨会(2011年7月)

一部分成文出版如下：

·“柏林”(《旅，建筑的行走方法》建筑文化纵览2006年12月出版，彰国社)

·“代代木公园”(《新城市面貌的别样风景》2007年8月出版，诚文堂新光社)

·“作为建造对象的城市和建筑”(《住宅特集》，2009年9月期)

·“世界普遍不景气和建筑”(《JA76》，2010年1月期)

·“东京的总体规划和建筑原型”(日本《新建筑》，2010年4月期)

二、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来

切入正题之前，我们先整理一下90年代后半期以来城市里都发生了什么，特别是和60年代的区别放在一起对比看看。

(1)现代城市的规模

所谓的G20各国完成现代化以后，90年代后半期产生了大量的现代城市，人口众多的亚洲圈尤为显著。印度和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是在90年代前期(印度1991年、中国1992年)，到90年代中期各城镇街区开始进行设施建设(能源开采、基础设施、港湾设施等)，接着在90年代后半期现代城市这种面貌陆续出世。其他各G20国家也突击步入现代化。90年代后半期以后的世界，是人类史上最大的城市建设高潮时期，与之前的60年代相比，这是现代城市无以匹敌的量产期。

(2)城市规划的停滞

G20各国的现代城市，比如中国的很多城市都是如各位读者所看到的具有典型60年代风格的规划(没有新城市类型的新城)^{注3}。尽管制度规划的是“西方国家”(欧美日澳)的城市设计事务所、土木设计事务所和建筑设计事务所，规划时间是90年代后半期，却是60年代的规划内容和理念的重复。

在欧美日澳多国专家的参与下，却只实现了与40年前同样的城市形态，也就是说，我们的规划技术在这40年间丝毫没有前进^{注4}。较之同样的40年前（1920年代末~1960年代末）的城市规划方法的持续进步，真是无可比拟。从这个意义上说，过去的这40年间（20世纪70年代初~21世纪10年代初），可以算得上是城市规划“失去的40年”。在这“失去的40年”中对城市规划方法的停滞或放弃虽然长时间存在，但90年代后半期以来开始广泛影响到的城市生活者和食品生产者。

（3）城市人口

城市人口问题，即人口流动性问题，是90年代后半期以来出现的两种现象之一。即（A）G20各国现代化伴随着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作为现代化进程中必然出现的问题，原G7各国在60年代都积攒了经验，流动本身并不新鲜，而庞大的流量确实是前所未有的（当今世界69亿人口中城市人口超过半数，达到36亿，无论总量还是比率都达到人类史上最高值）；（B）完成现代化的各国也发生了人口流动。即受到人口减少困扰的原G7国家在饱受大多数城市人口减少之苦的同时，人口又往一部分城市聚集（即城市间的竞争）。这不仅仅是本国内从城市A向城市B流动，还伴随着从国外城市C流动到本国城市B的现象（移民人口及观光人口）。

当今的城市形态（现代城市）就是在这两种类型的人口流动之上形成的，而这也是在90年代后半期开始出现的现象。

（4）资本和国家的影响

现代城市形态还受到（A）作为城市建设资本的投机市场的影响，和（B）提供城市运营经费的国家和自治体的影响。前者能在瞬间增大建设资本（并伴随其后急剧的减少），金融市场的这种影响又激化了90年代后半期以来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全面化、金融工业的发达和房地产债券市场的全球化。后者则随着原G7国家财政赤字的慢性化和税收不足（税收上升率低下）而使维持城市的运营越发的越不容易。这两点倾向在60年代不曾遇到，而在90年代后半期以来变得显著起来。

（5）信息革命

90年代后半期发生的信息革命虽然至今只有15年，却给当今城市带来了不容忽视的变化。到现在最大的变化是，（A）物资分配革命带来的城市变化。物流工程合理处理过剩问题，大的方面让港湾地区的堆场、仓储地

忽然没有用武之地而成为大规模再开发用地；小的方面则让便利店在老城区内四处开张。另一个大的变化是（B）通信网络带来的城市变化。最显著的是北美和北欧电力网的智能化。这两点是城市主体部分的物流和能量产生的变化，在作为城市的内核的物流设施与能源设施发生变化的基础上，信息革命触及的并非城市表层，而是基础性的底层结构的变革，这也是90年代后半期以来的事情。

（6）环境破坏

90年代后半期以来，近代城市的量产带来最大的影响应该就是对环境破坏。从现代城市的建设阶段到运营阶段以及城市圈内圈外同时贯穿着对环境的破坏。（A）城市圈外的粮食产地和渔场、林地、水源地等能源设施用地和基础设施用地、交通用地及资源开采用地、废弃物处理厂和废弃能源处理厂等等都持续地对环境产生着负面影响。此外（B）城市圈内的港湾用地、能源储蓄基地、城市开发和扩张共同作用，有力地影响着环境。（C）城市圈内气候恶化（现代生活对能源的过度消费）的持续进行。现代城市的特征决定了城市活动对环境的破坏永远都不会终止。对于这个问题在60年代部分专家就提出了警告，然而直到90年代后半期因现代城市圈在全球大规模的扩张才使该问题得到大众的关注。

（7）城市灾害

90年代后半期以来的现代城市经历着60年代前都从未经历过的城市灾害。发生于1995年的日本阪神大地震和地铁沙林事件，前者为天灾（城市型地震）、后者为人祸（恐怖主义）。假如不说原因单看结果的话，二者都具有城市功能的关键部位受到外力破坏的共同点[前者表现了从高速公路到地下水道，所有的基础设施的脆弱性，后者则是城市交通（地铁）和行政区域（霞关地区）的脆弱性]。这样的灾害促使人们对城市灾难、城市防灾的重视，从这个意义上2001年美国同时发生的多起恐怖事件、2011年的日本东部大地震都告诉了人们现代城市的脆弱性这一事实（前者是超高层街区类型的城市集中利用的危险性，后者是城市圈外核能发电站集中布置的危险性）。现代城市经过60年代的探索 and 实验，到90年代后半期开始才首次受到挑战和检验。

城市的现代化、世界人口的增加、地铁沙林事件等，年轻读者也有所耳闻，然而，在此基础上针对现状城市形态缺陷的把握和研讨，却几乎听

不到。比方说，年轻读者虽然考虑问题相对简单，但上述事件在人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是现代城市形态的初次变革，理解起来应该还是比较容易的，此外城市人口占世界人口一半、与之连带的食品和能源分配问题及废弃物问题，都是现代城市完全没有涉及过的领域。

笔者当然也不能超越这些问题去讨论城市应有的形态，然而，当今的城市会解决哪些问题，似乎是件无法预知的事情。或者说从90年代后半期以来，现代的城市形态已经成为需要解决的问题的一部分且应该被消除的危害的一种。这在文章最后的结论中也有所论及。

注3：需要说明的是“中国量产出来的现代城市”是在城市规划层面上的讨论，不涉及单体建筑风格，城市内建筑物是否是狭义上的现代主义建筑都无关现代城市的转型。

注4：过去40年间城市规划手法勉强称得上发展的，为数不多的实例是巴西的库里提巴城市规划(1993年)

三、20世纪60年代的现代城市批判

在正题之前还有一个需要说明的是关于现代城市的缺陷在60年代早已有强烈的讨论。《城市不是一棵树》(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1965年)《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简·雅克布斯,1961年)《城市原理》(简·雅克布斯,1969年)等论著相继出版。前述“失去的40年”，即过去40年间城市规划的停滞或放弃，我认为以他们的论点所产生的冲击为契机的。这个具有冲击性的论点，使同时代的专业人员停止了思考或者干脆放弃思考。在此，为了阻止“失去的40年”继续延伸，以下两点需阐明：

第一，关于他们的论著的使用方法或者阅读方法。

笔者并不认为他们的主张是错的，但是继他们之后的理论家却用错了方法。他们(借口)将放弃城市规划正当化，至今如此^{注5}。然而“城市没有规划主体”“城市规划不可能实现”等主张并不是由亚历山大等的论著中自动得出的结论。这些结论就算没有亚历山大等的论著也可能产生，就是是在考察城市的生成过程和规划主体的时候空想出来的。

本来城市是在时间与空间上相互分离的“复数的异质集团”，是无意识地共同创造的“作品”。凯尔特部落向古罗马殖民城市转换的时候，和

近代西班牙的港湾城市向现代城市转变时期，还有现代城市内部以城市更新的方式渐进时期，莫不如此。要说这些城市中突出的“规划主体”的话，像凯尔特的萨满教僧人与古罗马军团的精诚合作、近代西班牙的商队和现代主义者隔着时代的合作一样，都是集团长期的外部作用。这样“规划主体”的“制作”方法，正是城市固有的。这就是说，它不同于现代美术和工艺的制作观与主体观(单一主体的制作)，这也大致是亚历山大和雅克布斯的基本立场。应该说他们批判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中叶的特殊时期^{注6}现代主义思想下单一主体制定的新城规划模式，从本质上说，他们对之前的城市规划反而是抱以善意的态度，并对今后的城市规划发展无不寄予厚望。城市本来就是和自然生成相对照的人类创造的最大的作品(无论好坏)。然而，任何城市都是人类有意识“规划”出来的，自然界，从非自然生成的意义上来说是“人工的”“制作物”。此意义上城市“规划性”“人工性”“制作物”的属性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属性。当然这些对亚历山大和雅克布斯来说属于不必提及的常识，作为讨论前提而存在。可是，不知为何这个前提却被同时代的读者遗忘了，因而推导出城市规划不可行之结论，将亚历山大等的论著当作排挤所有城市规划主体的经典。

为了便于年轻读者理解再说细一点，亚历山大和雅克布斯说的是“如果像画家画画一样去设计城市的话，事情会变得无厘头，会产生只有这样才美的专断。”所以他们提倡今后的城市规划不要采取那样的方式，应该让公众参与、大家协力。这是在他们的论著中随处可见的观点并且希望是前进的方向。然而这40年来“单人作画行不通，城市规划就不要做了”却是现代人对此的误读。

第二，关于他们论著的内容。

90年代后半期的情况使其论点具有相对性。他们质疑的现代城市的缺陷(城市规划的树状结构、规划理念的思辨性、规划街区的匀质性、对多样性的扼杀、高犯罪率、对人行道的轻视、对社区的忽略等等)，都是城市“内部的”“短期的”问题，而90年代后半期以来城市还面临着“外部的”“长期的”诸多问题。笔者认为后者鲜明地反映了现代城市不成熟、不完善的一面。

G20各国的现代城市，特别是中国量产出来的城市规划都是前述典型的60年代风格的现代城市。都是没有读过亚历山大和雅克布斯的论著而

设计出的产物，不过话说回来，先贤们的警告其实都还是在城市内部反复发生的问题，但这并不是所有的问题。现代城市这样量产涌现，总体对“外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同时又可能引发什么“长期的”灾难并招致何种危机，这样“外部的、长期的”问题并没有得到相应考察。

毋庸置疑，亚历山大和雅克布斯对城市内部构造进行的大多数重要分析，笔者至今仍在意外场所见证其有效性，记忆犹新的不在少数（比如近年来吉祥寺本町二丁目一带戏台的产生，就是雅克布斯“老旧设施的必要性”的完证）。不过光有内部经验是看不到“外部的、长期的”问题的存在的，而那些可能正是“内部的、短期的”问题的导火索，所以对雅克布斯等的现代城市缺陷分析，还需相对地引入“外部的、长期的”维度。

如今，对60年代亚历山大和雅克布斯的理论是不是应该放到如下位置去考虑。《城市不是一棵树》的观点虽然是积极的，但就算城市规划成半格或组团状，还是不能消解城市“外部的、长期的”危机。还有“城市必须拥有多样性”这个观点本身是对的，但就算具备了多样性也一样面临刚才所说的困境。因此他们的观点需要和现代城市面临的“外部的、长期的”问题区别开来。

注5：矶崎新关于《浅谈艺术和建筑学的结合》的发言（2011年）。

注6：文中《19世纪末~20世纪中叶的特殊时期》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各自经济发展历程中，现代城市 and 现代建筑变成主流的时期，此外，这里所说的“20世纪中叶”也包含了60年代。

四、现代化历程

为年轻读者增加的还有一个注解，是关于现代城市的量产，作为预备知识和补充说明来写。

现代城市原本是某一区域或国家现代化过程（产业资本主义化）加速发展后的必然产物。因为“现代化过程”单纯地说就是这样一个一揽子工程：前现代的农业和渔业被能源产业、钢铁产业、交通产业之类的“近代产业”代替，现有的聚落和街区向“现代城市”转化，农民和渔民也移居到城市成为“出卖劳动者”（现代人），从自给自足的生活迈向“现代生活”，

在此基础上征收的税金和民间资本又建造出广义的“现代建筑”、再以羊毛出在羊身上的方式大量生产出广义的“现代住宅”。这一流程中必不可少的捆绑是“现代城市+现代产业+现代生活+现代建筑+现代住宅”，只要一引进这项捆绑清单的地区和国家就只能踏上现代城市扩张的不归路了。全世界享受着现代城市和现代生活的人口在20世纪初有1亿6000万人（约占世界人口的1/10），到20世纪中叶已经达到6亿（约占世界人口的1/5）。在那个时候现代城市就算多少有点缺陷，但从全局来看可能也算是件小事。而90年代后半期以来，G20各国持续地进入现代化历程，在21世纪初的今天已经有35亿人口居住在城市（约占世界人口的1/2），今后预计还有10亿人左右加入城市人口行列。现代城市的缺陷较之100年前影响扩大数十倍，已经不是件小事了。比方说60年代受到质疑的现代城市的人工性和商业性，在90年代后半期已然成为全球环境破坏和资源争夺的主要因素。笔者也无法完全中立、公正地预测今后现代城市 and 现代生活所带来的影响^{注7}。然而，就算是年轻读者也能够可在可获得的数据范围内得出下面的预测吧。

日本高速经济发展期实现了大规模的新城（配备了办公、商业、居住的区域），在东京郊外大约容纳了40万人（多摩新城、港北新城、筑波大学城），大阪郊外约20万人（千里新城），从设计阶段到全部入驻大约要30年。总之，日本的高速经济发展带来的现代化使平均每年有2万人转变到了现代生活方式（仅算新城）。事情若像前不久某著名投资家所赞扬的那样，世界城市人口如果从35亿扩大到60亿的话，必然会带来经济利益的话，那么消费那些金钱的环境也好、街道也好、人类自己也好大概都灭绝了吧。

现代城市并不是一个适合60亿人生活的理想形态。它是从1亿人到6亿人为前提提炼出来的产物，而从6亿人扩张到35亿人的过程中，人们却没有对城市形态进行改善。90年代后半期以来，亚洲圈毫无创意的复制并批量生产，加上人口增多、环境负荷加剧，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

另一个头疼的问题是，导入前述现代化捆绑清单的国家在本国内批量生产后，必定又向其他国家输入。G20各国在完成各自的现代化之后20年左右又会向其他国家的现代城市移植。

然而，日本人对这个“现代城市移植问题”负有特殊的责任，年轻的读者是必须知道的。“现代城市移植”野蛮的扩张是由日本吹响的号角。

众所周知，日本的幸也好不幸也好，作为非欧美圈的国家首先实现了现代化并达到经济的高速成长，这之后中国和印度应声而起。就是日本将高速增长模式化，捆绑成可放之四海的成功秘笈，这样的操作菜单的成型也是在日本60年代左右。

顺便说，日本之外其他原G7各国的ODA主要在灾害援助、医疗等方面给予人才、软件等多方面援助，与之相对，日本的ODA在亚洲圈仅以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为主^{注8}。这些设施都是现代城市不可或缺的立城之本(基础)，所以日本在90年代后半期以来对亚洲圈的现代城市量产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简而言之，日本是亚洲现代城市规模的当事者，不仅提供了经济高速发展的方法、还提供了启动资金，它是现代城市量产的推动者。而将这样庞大的现代城市移植将来会带来什么后果，需要负责解释并检验的也是日本的专业人员(城市规划者、土木设计者、机械设计者、建筑设计者)。如果怠慢了解释并检验的责任，就跟大量倾销残次商品的无德商人一样了，而也给后世留下不良记忆。曾几何时，现代城市也是由欧美移植到日本的，90年代后半期以来，又从日本向亚洲邻国移植(当然直接从欧美向亚洲移植的也很多)。在这个过程中对现代城市的缺陷没有得到广泛的认识，同时政府之间、经济界也都没有异议，顺顺当当地进来了。事态如不良传销一样向前推进，而对现代城市的缺陷性一直没有达成共识。

若是至福之事这样的移植和规模也还好，但从何种角度去看，不容乐观的事情都太多。从“内部的”城市观出发，乐观仅限于局部地区和城市，而且不到100年的城市评价也只能是“短期的”城市观。确实，从“内部的、短期的”来看，现代生活比传统生活在便利性、机械性上都有所改善，然而这些“内部的、短期的”评价体系在评价一个城市上属于无意义的指标。对城市的生存来说，“外部的、长期的”评价体系应该放在首位。因为城市本来就是需要依靠调动“外部”的能源、食品、人才、信息和技术来运营，如果没有“长期的”持续供给，城市也不能成为城市了。

建筑和城市方面的专业人员从“外部的、长期的”视角上应该是能看到现代城市充斥着不足的，同时也不会自信满满地肯定现代城市的大量复制。而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是无药可救的，他们只关注眼前的“内部的、短期的”东西。但是没有这样的建筑或城市专家试着去改良“长期的、外

部的”隐患。

再次重申，把握现代城市“外部的、长期的”隐患是非常重要的，而消除隐患并构筑新的城市形态更为重要。当然实现构想需要一步一步地完成，先部分实现也是有意义的。这在现代城市建设高峰的今天也许是徒然，从长期来讲，人类必定会建立新的形态来取代旧的。当然并不认为一篇文章就能达成一致，但可以作为基础，由专业人员一步一步的积累和修正，也许有一天能获得大家的认可，笔者尤其对从小就受到城市缺陷困扰的年轻读者们心怀期望。

注7：对批量的现代城市的未来的预测有很多角度，而公正、中立的少，尤其是证券和银行等综合研究所和现代经济学者的预测值得怀疑。其次就是政府下属的城市规划研究所和智囊团，此外还有城市规划咨询公司的预测，因为亚洲国家的现代城市批量化的理论就是由这些人推动的，很难期待有中立的判断。

注8：对这种异常投资的官方说明如下：由于日本的和平宪法规定不能派遣军队进行抗灾抢险和维持治安，所以要借助建设城市的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来应对抗灾抢险和维持治安问题(根据日本外务省HP)。这种冠冕堂皇的说法具有明显的矛盾之处，因为即便是在战前没有和平宪法的时期，日本照样执着于投资建设亚洲国家的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建设，外务省的这段说明并不成立。

现代城市的9项缺陷

现将现代城市的缺陷归纳为9个方面，与之对应亦有9条针对新的城市形态的改善对策。

1. 新型贫民区问题
2. 人口流动问题
3. 分区问题
4. 食品和能源问题
5. 生态系统问题
6. 现代交通问题
7. 安全问题
8. 交流性问题
9. 城市寿命问题

为便于理解，详细说明如下：

1 新型贫民区问题

通常人们认为现代城市的一大功绩就是成功清除(再开发)了贫民区。然而，从外部的、长期的角度来看，现代城市几乎没有解决贫民区问题，仅仅是把解决延迟了而已。城市现代化过程中看似清除了贫民区，却只是一种内部的、短期的错觉。从外部的、长期的角度，现在日本的贫民区也仍然在明显地扩大，只是不容易被发现罢了，因为现在的贫民区已经进化到与过去完全不同的类型。

拿日本国内最新的贫民区为例，就有“除夕派遣村”(译者注：2008年12月31日到2009年1月5日，由数家NPO和劳工组织在东京日比谷公园开设的避难所性质场所，为流浪或失业者提供食物和住宿。)、网吧难民(译者注：指日本国内居无定所，日打短工、夜宿网吧或简易箱式旅馆等的贫困人群)这样的新型贫民区。虽然这些人并未非法居住，作为被剥夺了土地成为城市人口的后代，在城市中除了出卖劳力并没有其他获得食物和资源的手段。这样的生产状态和近现代的农村、渔村中自给自足的生存状态似是而非。网吧难民的出现和过去贫民区的生成原理是一样的。

贫民区，指本不应该却居留了低收入劳动者的区域和场所。低收入劳动形式过去只有日工、季节工之类，现在则出现了各种各样丰富的类型，如外派职工、合同工、打工者、自由职业者、就业浪人(译者注：在日本指应届毕业生待业的人)、风太郎(译者注：在日本指有就业愿望的无业者)、尼特族(译者注：在日本指既不愿上学也不愿上班的人群，这些人通常受到媒体网络影响)、家里蹲等。这些人不应该却居留的场所，就是今天的贫民区。

联想到19世纪那种贫民区的话，新型的贫民区很容易被忽视的。今日的贫民区具有从外观上难以判断的特点，内部既有像传统贫民区那样的(如东京的山谷地区等)，也有空调、饮料一应俱全的单间(如网吧)。只有不受各种外表的迷惑，抓住共同的特征，才能嗅出新型贫民区的味道。一般来说，新型贫民区产生的背景是新劳动法(雇佣形式)的出台和定居形式的发明。比如平成年间的不景气造成了蓝席难民(译者注：指在地上铺一种常见的蓝色塑料布露营的难民)、派遣法造成了网吧难民、总量规

制(译者注：1990年3月日本大藏省针对金融机关出台的行政指导，旨在抑制土地相关融资，最后引发了房地产泡沫的崩溃)则引发了郊外高层公寓的贫民区化(空洞化)。

就这样，我们司空见惯的地方在不同场合都有可能成为新型的贫民区。一个最极端的例子就是城郊新城(卧城)，在特定的时期就属于新型贫民区。当然新城的居民都不是非法居留者，不过很多是被从过去的农村、渔村赶出来依附到城市边缘生活的人，现代城市变成了他们唯一的生存场所。这些的生存状态基本上只能靠在城里出卖劳动力换取食物和能源，否则便无法生存，这在近代的农业聚落中是没有的，这是从19世纪才开始的贫民区的贫民的生活状态。尽管城郊新城的居民被称作“中产阶级”，实际上在经济高速发展期的“中产阶级”就是低收入劳动者的变体，除了卫星城哪里也去不了。这些卫星城就是让人看不出来的，经过粉饰的新型贫民区，专为经济高速发展时期而存在的“中产阶级=低收入劳动者”的巨大贫民区。此外，也有说法认为这些卫星城随着少子高龄化而贫民区化(空洞化)。这样看来，这些并不是忽然被贫民区化的产物，只是看问题的角度将其本来具有的准贫民区本性的实情揭示出来。卫星城的现象近年来受到关注，简单地就是对新型贫民区的关注，即对现代城市长期的、外部的缺陷的关注。

还有一个希望年轻读者记住的新型贫民区，是东日本大地震当天东京圈的回家难民，这是最新版的新难民窟。回家难民是由于城市交通的瘫痪而无法回到卧城的上班族，只能在车站等公共设施和衣而睡。他们虽然也不是非法居留者，但为了上班每天都涌入城市，视城市为唯一生存场所。回家难民停留的地方成为瞬间的高流动性新型贫民区。

就这样，新型贫民区渐次出现，将来还会推陈出新。因此“现代城市已经成功清除了贫民区”这样的普遍认识实际上只是一种短期的内部的错觉。从长期外部看，现代城市(以及产业资本主义)正是贫民区层出不穷的原因，退一步说，现代城市会源源不断地需求新鲜的贫民。发展的过程中就会带来新型贫民区，在“调整”劳动人口中成长的都市形态，就是现代城市。

笔者自然对这些世界范围内批量生产的巨大新型贫民区特别关注^{注9}。此外，对网吧难民和回家难民之类的新型贫民区也不落后地保持关注。

那里凸显了现代城市的软肋，暴露出其缺陷性。

反过来说，现在的城市形态在何种程度上克服现代性迈向新的阶段，新型贫民区的形式分析也是一个判断标准。从这个意义上，当今的新型贫民区在一点点变得多样并细化(尽管贫民区的总面积在增加)，同时新型贫民区还越来越难以为继，都暗示了将来城市的走向。

现代城市的下一步，一定不是一个空想的未来城市，其萌芽必然在现代城市的缺陷中，在与各种缺陷的斗争中涅槃而出。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城市和未来城市的区别围绕贫民区问题有如下差别：

首先现代城市的历史是在根治贫民区的宣言中开始的，这是一段新型贫民区层出不穷的历史，城市依存着新型贫民区的诞生“成长”或“低成长”的历史。这里的“成长”与经济同步，高速成长的经济伴随新型贫民区的产生，经济泡沫崩溃则引发另一种新型贫民区的出现，经济微增长的低成长时期亦同理，这就是现代城市挣扎的历史。与之对应的是后低成长时代的城市形态，归根到底，是预备为脱离资本主义时代的城市形态，换句话从贫民区问题来说，就是不会也没有必要产生新的贫民区的城市。那样的城市不会为了“调整”低收入劳动者的聚居地而扩张，能维持稳定状态。

用城市规划的方法来说，现代城市规划所进行的清除贫民区(再开发)实际上只是制造新的贫民区并使之扩大化，是看不见希望的，应该反过来去考虑保护维修已经生成的多种多样的新型贫民区的可能性。日本国内历代贫民区主要类型就有(A)传统的木结构街区；(B)战后贫民区或营房；(C)战后复兴时期小作坊式居民区和木结构住宅地带；(D)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卫星城；(E)平成年间不景气时期的空巢高层公寓；(F)新自由主义政策期的高层公寓街区；(G)城市间相互竞争时代国外移民的聚居地；(H)低速增长时代的网吧、漫画吧(杂居楼)；(I)派遣法时代的除夕派遣村(公园、河川)；(J)老年化社会中老朽的木造租赁公寓区；(K)就业困难时代的合租房(老旧公寓)；(L)大灾害时公共设施的用途变更。共12种，今后，为了保证现代城市的命脉还会有更新版本出现，但必须将其限定在有限的类型之内，绝非无限增加^{注10}。假设最高达到20种贫民区，首先要保证不试图去将历史造成的20类贫民区都清除掉，相反应该逐个保护维修让其继续生存下去。这样做的理由一方面来自于现代城市规划史交给

我们的无法根除贫民区的宝贵经验，另一方面保护维系贫民区的多样性有助于提高城市整体的稳定性。稳定性是不能够被有意识规划的，唯一能够掌控的是将原有事物保护起来并重新利用时在何种程度上“广而浅”地保持这种稳定，它对城市长期的、外部的生存和延续具有决定性作用。特别是新型贫民区问题(劳动人口问题)纠结并困扰着现代城市，却也是唤起新的城市形态的契机，稳定作为人口缓冲剂非常重要。所以城市总体规划的作用应该重新定位城市中的贫民区区域，就像近代城市总体规划将森林河流等作为保护对象一样，现代城市总体规划也应该将12种历代贫民区列为保护维修地区(有必要取代自然公园法拟定贫民区保护法)，不管其现状好与坏，如同我们对待自然(绿地)的态度一样。为此，规划思想的转变和理论框架的重组都是有必要的，而且在我认为在很多方面已经开始引起思考了^{注11}。最后，这些多样而稳定的贫民区会根据各自的公共单元分散维护，在别的方面，可以取得如此效果的制度转换与权利让渡等试行已经展开了^{注12}。当然每个城市情况不同，有由于城市竞争导致人口急剧减少的城市、也有因移民和观光使人口增加的城市。在讨论对现有贫民区区域的保护和维修的同时，还有受到破坏的例子。这些受到破坏的地区，并非再开发用地，和前述须保护维修的贫民区地区不同，它们可担负别的作用。比如，人口急剧减少导致破坏的城市地区，可以再转为农业用地或能源用地活用。这些是促进城市向聚落转换的区域，在这种情况下，总体规划其实是缓和蜕变过程，协助城市进行“安乐死”。这种针对破坏地区的总体规划比上述针对保护修复地区的总体规划还要重要，是保证现代城市长期的、外部的发展的必要手段。

以上展望的要点就是抓住现代城市稳定的子群。关于每个子群的内容和集合方法，将在下节继续讨论。

注9：笔者关于卫星城的相关讨论见《近代都市》一文(《10+1》创刊期，1994年)

注10：新型贫民区不可能无限发生，因为经济成长不可能无限持续，城市人口也不可能无限增长。

注11：前述新型贫民区(卫星城)受到各界瞩目和现代思想中意图根绝贫民区无关，也和战后对贫民区肮脏现实主义式的欲望无关，这是向其他价值观的转移，这种价值观在日本之外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中正在酝酿。

注12：文中“小的公共单元”指现在各自自治体的市民团体、一般社团法人或宗教法人、NPO或NGO，不仅在日本，其他发达国家也有，以政府向市民团体委托业务的形式进行各种各样设施的维护和试错运营。

2 人口流动性问题

现代城市的第二个缺陷就是城市人口的相关问题。现代城市规划一直都轻视人口流动性的缺陷，其发源于现代城市诞生之际，人口流动性是个很困扰的问题，作为一种怀柔策略，当时的规划思想是将城市布置成一个个聚落(社区)，使流动的人口得以定居。然而，城市人口一定是具有流动问题的，和聚落的人口问题(人口定居性)是完全异质的两个问题。如果不明确地区分二者，就会反复错误地介入城市^{注13}。

这个问题(对人口流动性的轻视)，比现代化问题还要重大，且将越来越重要。同样在此将为年轻读者说明一下城市人口流动性的原委。近代城市的诞生发端于人类史上罕见的“异常人口流动”，即19世纪上半叶忽然有很多人口涌入英国各城市，因为工业革命带来轻工业的发展，工场在城市内林立，工场主们从农村引进了大量农民工，作为劳动力持续输送到城市。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的《英国劳动阶级的状态》(1845年)记录了1840年代曼彻斯特、伦敦等地罕见的人口流动的始末。很多街区一夜之间沦为贫民区，状况令人咋舌。今天的新型贫民区(除夕派遣村和蓝席难民)相比起来如同乐园，贫民区来势汹汹(资本的原始的积蓄)。中小规模的纺织工厂慢慢渗透到自中世纪以来就没怎么进化的城市，工人街区突然间全部贫民区化，这样的情况层出不穷。街区中的住所仅12㎡左右一间，12个人挤在一起，包括老人小孩都是劳力。因为没有下水设施，撬开地板做粪坑，像猪圈一样。在这种居住环境下，不知情的病疫陆续爆发(斑疹、伤寒和霍乱)。年轻的恩格斯愤怒了，但他的记录真实准确，不像同时代的宗教团体或英国政府记录那样的夸张。

人口流动性，是与工业革命的启动一起产生的不可逆转的变化。就算历史重演一次，工厂主和英国政府也不会悔改并停下脚步。况且工业革命对人类来说是完全未知的，想必资本家和英国政府也都无法预测这将带给城乡不可逆转的变化。现代城市规划的常识是在解决城市问题的过程中建立的，譬如工作区和居住区的分离、上下水道的设置、适当的人

口密度设定，各种各样的常识在试行中精炼。然而所形成的这些常识的根基是对贫民区的敌视和对其造成的人口流动性的恐惧。之后所有的现代城市规划大体都继承了这一点。

到了19世纪末，工业革命的主战场从轻工业转移到重工业，城市的人口膨胀大体成型。但是，因为数十年前不正常的人口流入依然记忆犹新，人口流动依然是最可怕的城市现象之一。在19世纪末这个特殊的时期，暴风骤雨般的人口流动在产业结构转换期一刹那间戛然而止。这时出现了成为后世现代城市规划源流之一的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的《田园城市》(1898年)。当然在《田园城市》中也对人口流动性加以警示，譬如《田园城市》将居民们放在与合作社挂钩的土地内，就是一种阻止人口流动的办法。总之它阻止了像今天土地私有制带来的过度的土地流动性=人口流动性(乱开发带来的人口流动性)。《田园城市》将土地周边围上绿地，也控制了城市蔓延带来的土地流动性=人口流动性。然而，《田园城市》在其中将稳定人口流动性作为理想，与其说是将城市不如说是把乡村(社区)作为理想东西，这就是最原始的错觉。

原来确实也有些社会活动家评价霍华德有乡村(社区)而非城市的倾向，有些章节甚至让人觉得城市和乡村都可以互换，似乎人口流动性(城市)和人口稳定性(村落)是两个可选菜单，然而对于启动了工业革命的城市来说，那样的选择是不可能的。人口流动性(城市)和稳定性(村落)之间，横亘着不可逆转的变化，一旦进入工业革命，任何城市都无法逃脱人口流动的魔咒。

霍华德的“田园城市”，譬如莱奇沃思(Letchworth)，100年来至今大体保持着良好的环境，看起来好像是克服了人口流动性的城市风姿。然而看起来克服了人口流动性的“田园城市”只是因为它其实并不是城市。当然它有工作区，不单纯是一个卧城(居住区)。但有工作区并不意味着就是城市，村落也有工作区(农场、渔场)。城市和村落的区别，和具不具备工作区无关，必须由人口流动性的有无来判定，从这个意义上“田园城市”就不是城市，只是现代的村落^{注14}。

换句话说，区别城市和村落就在于人口的流动性(城市)和稳定性(村落)，对前者的关注是现代城市规划(工业革命以后的城市规划)的绝对首要。被从农业用地和渔场解放出来的人们，如何生存的问题，即城市的

人口流动问题，是现代都市规划应该专心致力的最大的课题。但是，现代城市规划的主流，像在把“田园城市”作为一个规范来寻求稳定人口流动性的问题，极端地讲，不就变成了要让城市(人口流动性)回归村落(人口落实性)一样。这个思想，被很多20世纪的现代主义者认同，以20世纪初在德国建设的威丁的席勒公园居住区(Siedlung Schillerpark)^{注15}为首，都试图解决人口流动问题。

从“短期的”说，通过设计似乎能创造没有人口流动性的街区。然而，这个状态是难以“长期的”维持的。再来一次工业革命，也不可能避免人口流动问题。人口流动性是贯穿工业革命以后城市的“长期的、外部的”严峻现实，人口流动性和稳定性之间存在着不可跨越的鸿沟。

尽管推进现代城市规划的现代主义者们认为人口流动问题可以解决是因为只看到了城市“短期的、内部的”情况。从“短期的、内部的”来看，城市可以看作一个大大的村落，城市(人口流动性)和村落(稳定性)的差异变得模糊起来。但是如果从“外部的、长期的”来看，村落是为了“特殊的土地”(食品产地、能源产地)扎根的人们的生存据点，城市是被从那样“特殊的土地”上分离的人们生存据点。在这个意义上，现代的开端不是城市远离乡村的时期，是人口流动无法回到稳定的时期。

人口流动性是不可逆转的。大多数现代主义者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这一点。他们无论如何也想要消解人口流动性(城市)，使其回到稳定(村落)。其结果就是现代城市规划最终只能是“短期的”实现人口稳定(村落)的东西。代替“特殊的土地”(食品产地和能源产地)的使人定居的东西(譬如宅地)，实际上是不能替代食品生产和能源生产的，不能成为“长期的”生存据点。所以“长期的”人口流动性必定束缚着现代城市规划。

对人口流动性的轻视，不仅是前述20世纪初的德国的现代主义者、20世纪上半叶的北美的现代主义者(实用主义者)如此。科拉伦斯·佩里(Clarence Perry)的邻里单元理论是个典型。邻里单元理论认为，一个邻里单元街区规模应控制在5000人左右，其中设置小学和公共建筑及设施。街区内设置基本的步行区与外部交通相连，沿外周道路排列店铺。规划人口被更大的开发时再增加单元的数目，这是一个非常方便好用的规划理论。但其对居住区构成和人口构成的规划手法仍然反映了一种村落(社区)理想，将稳定人口作为目标。因此，根据邻里单元理论建造的街区，在

能保持人口稳定(村落性)的期间大致良好，却也具有一旦人口流动就会面临荒废的缺陷性。

这个缺陷性的暴露是在90年代后半期，其他国家借助邻里单元理论创造出各种各样的卫星城或卧城。邻里单元理论，被20世纪中叶G7各国的公共住宅区和郊外卫星城的规划手法采用，变成对60年代的开发项目的理论支持(支撑了日本以多摩新城为开端的住宅、城市建设公团(城市再生机构)的开发事业)。可以说每个住宅区及郊外卫星城都保持了30年左右的人口稳定性，居住环境得以保存。不过，90年代到后半期以来人口流动与土地流动的复燃使这种模式开始露出破绽。

破绽的契机，主要是(1)土地的流动化。以土地私有制(投机制)和新自由主义政策(容积缓和)为契机，譬如周边地区的高层公寓林立使人口流动复燃，地域人口密度分布的变化破坏了邻里单元的原始模式；(2)物流的统筹革命。譬如周边地区便利店和郊外大型店铺的出现，急剧改变了当地店铺的平衡及居民的活动范围，邻里单元设定的店铺比例和交流性被蒸发；(3)少子老龄化。引起迅速空巢率的少子老龄化现象，也是在现代的村落(农业共同体、渔业共同体)中没有发生过的事，这是现代城市的居住模式(由夫妇与未婚子女组成的小家庭的房产制度)下第一次产生的现象，亦为人口流动性的另一面，是为邻里单元的空洞化。不管哪种情况，都具有人口一开始流动，稳定性(村落性)随即崩溃这样的共同点。邻里单元理论，为了实现人口“短期的、内部的”稳定性(村落性)，面对“长期的、外部的”人口流动的干扰没有防备，具有脆弱的一面。

现在世界各国的地区开发都借用邻里单元理论，尚未建立面临人口流动的防备措施。因此，不管是现在保持着良好状态的“短期的”旧G7各国还是G20各国的郊外卫星城或卧城，都面临着受到“长期的”人口流动颠覆的可能。试想，走到崩溃尽头，作为郊外卫星城或卧城本性的贫民区性就会喷发。从19世纪开始，贫民区的人口流动性问题就是想切也切不断。因此郊外卫星城或卧城潜在着贫民区的本性。譬如中国拥有大量共计600万人的大规模卫星城，就是毫不例外的新型贫民区。今后，如果不针对人口流动性采取对策，30年后便可能出现惊人的问题。

于是这样的思考就复活了——街区人口的减少，会暴露新型贫民区的本性，因此稳定性极为重要，村落化(社区化)也是必要的。但那是错误

的要求、错误的想法，因为即便努力实现也只是“短期的”，贫民区本性终将暴露。人口流动性复燃一般是在30年到50年左右，这对城市来说与其是“短期的”不如说就是“瞬间的”。

诚然现当代主义者的工作也有好的例子，比方说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间战后各国专为低收入者修建的公寓和住区。因为他们是明确地将其作为贫民区来建设的，已经意识到低收入者总是会维持一定规模存在着，所以具备了产生应对人口流动的建筑模型的可能。但是，尽管无论决策者还是策划方都予以期待，重要的设施设计者(现代主义者)却粉碎了这样的印象。恐怕对大多数现代主义者来说，所谓低收入者专用集合住宅，不过是单纯的“贫穷的村落”吧。就是发展中国家的过渡性产物，与经济发达的欧美无缘。还有，对某些现代主义者而言，人口流动性充其量就是廉租房，人口稳定性就是商品房的概念。但是人口流动性并非“短期的、内部的”议题，工业革命以来城市，不管是贫穷的国家也好、富裕的国家也好，穷人也好、富人也好，租房住的也好买房住也好，这都关乎群体的生存状态。而且，在人口流动性问题上，穷人有穷人的流动性，富人有富人的流动性，国家也同理，人口流动性可以分类讨论，甚至规划时的人口流动性是A型，50年后变成B型或C型。或者，至少一部分的街区可以试着进行预备人口流动性A型的建筑与街区实验，但是大多数的现代主义者看不到这种感觉^{注16}。

就这样，现代城市规划从19世纪上半叶到21世纪初的今天，一直避开人口流动性这个问题，专门拘泥于稳定人口，过程中产生了庞大的新型贫民区。所谓现代城市规划的历史，最初始于对人口流动性无尽的恐惧(19世纪上半叶)、后来发展到警戒层面(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接着转移到轻视(20世纪中叶)、最后变成现在的搁置(20世纪末~21世纪初)。这样前后大约3个世纪对人口流动性的置之不理，难道不是现代城市规划难以修复的污点吗？

反过来说，现代城市之后新的城市形态，应从疏离了3个世纪的人口流动性问题中走出来。反其道而行之，没准就能找到出路，首先要将人口流动性作为前提。关于现代城市之人口流动性的前提，下面试做分析。

当今城市人口有35亿人，都是可以流动的。这35亿人不像近现代村落一样要扎根在“特殊的土地”(食品产地和能源产地)上才能生存，他们

是从那种土地上割离下来的流动化的人。这35亿人的生存据点就是城市，谋划的是城市规划。不可能让全部35亿人定居于“特殊的土地”(食品产地和能源产地)上，也不可能使35亿人都成为村落人口。现代城市规划留下的经验是让他们在另外的代替地(譬如住所)上安定下来，但是食品和能源都不生产的代替地不能作为长期的、外部的生存据点，所以30年至50年过去，人口流动问题就会出现。

因此可以认为对现代城市规划来说，能走的路就是摸索人口流动性自身的自然增长规律并控制它。换句话说，就是要关注人口流动性实际上带来着什么样的城市现象，沿着其倾向和规律，转换城市规划的目标，并在规划手法上下功夫。打算把城市恢复为村落(准村落)的现代主义的规划目标，是无视人口流动性的恣意的目标。必须紧密结合人口流动性带来的城市现象来改变目标和手法。

如文章开头“90年代后半期以来”叙述的一样，现在的人口流动性很大程度上说有两个类型。现代化初期出现的人口流动性(农、渔村→城市)，和终期出现的人口流动性(城市A→城市B)。前者发端于19世纪英国的各城市，今日G20各国的城市正在经历。后者是在今天的旧G7各国城市中凸显的人口流动性。并且后者是在前者的延长线上自然产生。因此可以认为现代城市规划要挖掘的未来城市潜藏在后者的人口流动性中。

后者的人口流动性，在90年代后半期以后总算作为城市现象得到海内外认识，其倾向和规律虽不能充分地阐明。但是有几点，这里尽量排除先入之见，试着关注以下的5个倾向：

(A)旧G7各国的城市人口达到国民数的70%左右，后一种类型的人口流动性激化，特别还伴随来自海外的人口流入(移民和旅游)。

(B)后一种类型的人口流动性，不仅伴随各国内部城市人口流入，还有来自海外城市的人口流入(移民和旅游)。

(C)人口流动性使一部分的城市人口集中，其他城市人口减少，扩大了两极分化。

(D)在两极化中，人口集中的城市倾向于变成广域的城市圈(东京圈已经突破了3000万人口)。

(E)同样在两极化中，人口减少的其他城市，中心区域持续空洞化的同时，周边地区继续着低密度的开发(低密度城市蔓延现象)是为另一个意义上

广域的居住圈。

当然今后也应该会出现上述5个以外的城市现象，不过，在这里先以这5个为前提。下面就结合现代城市的规划目标来说明总体规划的各个步骤和区域。

这些正在两极分化的城市圈、居住圈的共同点，不是中心集约型而是广域型、多焦点型。当然两者的人口密度、面积和规模也明显不同。要尊重这个广域现象的话，首要的，绝不可将这些的广域的城市圈或活动圈，逆转回中心集约型。譬如像日本交通部说的一样将紧缩城市(compact city)作为目标，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人口流动性的出现，绝对不会朝紧缩城市方向发展。在此状况下强行实现的紧缩城市，会和新一轮清除贫民区一样，最终回到产生新型贫民区的道路上。而且，紧缩城市这个规划目标，仍然以旧的静止的总量来把握城市人口和国民人口，把城市人口当做是乡村人口一样。那必定回到试图稳定流动人口的思路，再走向新型贫民街的产生上。就像反复说的，人口流动性的问题对城市规划来说是块硬骨头，不可小觑。要致力于人口流动性，就不能依赖过去3个世纪的常识。

5个城市现象浮现的，是更“多焦点的”“广域的”的城市形象。可以说是各部分密度分布不均、呈条状或斑马纹状的广域城市。

所谓“多焦点的”与过去的城市蔓延现象不同，那是从城中心向郊外蔓延，大致具有中心是稳定结构的特征。而上述的广域现象，城市中心变成很多其他中心之一，蔓延区域也成为别的中心之一，是一个“多焦点的”构造。

再说“广域化”，笔者认为，假如日本的人口即使从1亿3000万人减少到6000万人，也没有理由配合人口总数缩小各个城市的面积。极端的两极化(人口集中的城市圈与人口减少的活动圈的两极化)还会继续，极端的情况不是紧凑化，而是前所未有的城市圈和活动圈结构。

从人类史的城市形态变迁中可知，近现代时期，显然是所有城市的实验场、所有人口密度和设施密度的实验场、所有建筑类型和活动圈的实验场。这个实验场，有像东京一样的广域的、低密度的城市类型，也有像香港一样高密度的城市类型。准确地说，在香港1000人/公顷的街区可能紧挨着200人/公顷的街区，这就是密度差组合的实验场。或者看东京的

某区域，一方面高层公寓区隔壁就是近现代的木造传统街区，而两边都是同样的800人/公顷，这就是建筑类型和设施密度的实验场(东京中央区佃岛)。当然东京的实验性还体现在城市面积和城市密度上，在何种程度上算是广域、又在何种程度上算低密度。从城市面积和活动圈来说也是实验场，活动圈既有比城市面积大的情况、也有极小的情况。这样的各种各样的城市现象，不仅仅发生在现代，一定会进入今后的城市形态。设施密度和人口密度都不均匀分布的广域城市，应该在反复试行探错中积累经验技术。

在这里对前述“现代城市稳定、异质的子群”做个展望的话，其中应包括人口密度不相同的多个区域群。还有，街区作为规划单位也是相对的，街区与建筑在逻辑上不同类，而香港也好东京也好，同样都可作为城市要素被并置。这些不同子集都能被广域城市吸收。另外，稳定的广域城市，在领域上从边远的郊外到过去的中心部位，囊括了广大的范围。而人口密度、设施密度、空地率应是不均匀的，不存在整体高或者低密度的状态。更进一步说，这个稳定的不均匀的广域城市圈，也有可能几乎没有边界，所以城市和村落两者都被包含在内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顺便要说的是，条状或斑马状的广域城市，可能会立即引起反驳，大概年轻读者的脑海里已经浮现出维持基础设施的不经济性、能源运输的损耗性、物流的低效率性等问题。所以没准也会得出不可能运营广域城市这样的结论。确实，在现有的国家、资本体制下，确实不可能。然而，由现代国家和资本运营城市这样的理念，是过去3个世纪以来建立的常识，也有可能是错误的。意味着我们有必要怀疑这个常识，不过关于这个问题(简单地说就是现代城市的营运主体)，随着各章节的循序渐进，读到最后，应该能消解疑团。

就此搁笔，现代城市后面的7个缺陷请听下回分解。

注13:本文所称“人口稳定性”“人口流动性”用语，与在社会学、政策学和房地产学的意义内容有所差异。这里所谓的“人口稳定性”“人口流动性”，是以城市规划的需要为限。即所谓“人口落实性”，是定居在食品产地和能源产地的“特殊的土地”上的人们的生存状态。相对所谓“人口流动性”，指与“特殊的土地”隔离的人们的生存状态。前者为生存谋划村落，后者为生存谋划城市。本文中写为“城市(人口流动性)”“村落(人口稳定性)”的地方是为了强调生存战略的差异。